

# 第一章 欧洲隐喻研究史介绍

## 1.0 概述

在欧洲，“隐喻到底是什么？”是一个古老的问题，其足迹一直可以上溯到西学的发源古希腊罗马，西学里第一个系统地对隐喻进行理论性探讨的大思想家是亚里斯多德。亚氏在他的《诗学》和《修辞学》中有大量关于隐喻的定义、例子和思考。亚氏对于隐喻的定义直到 20 世纪初都没有遇到任何严肃的挑战。20 世纪 30 年代，对于隐喻的研究突然多了起来，到 20 世纪末，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强有力的潮流。对于研究隐喻的人来说，认识一下西学隐喻研究史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但因为欧美——近 30 年来尤其是在美国——对隐喻研究史有大量的文献，因此我不想简单地以欧美现有的文献为基础作介绍。在本书中我将首先介绍隐喻研究的两大理论，然后讨论隐喻研究的几个核心概念，最后介绍西学中围绕这些核心概念曾出现过的争论，以期从自己选定的这个角度向读者展示西学中隐喻研究的历史。

① 关于隐喻在艺术中的作用参见 Weinrich (1976: 318 ff.), Aldrich (1968: 152 ff.) 和 Jakobson (1960: 169 f.)。关于隐喻在经济文章中的作用参见 H. Weydt (1986: 88) 关于隐喻与哲学的关系参见 Richards (1936 33 ff.), Black (1954: 60), De Man (1978: 432 f.) 和 Haverkamp (1996: 2)。关于象征与隐喻请参见 Wheelwright (1960: 115)。

## 1.1 隐喻研究的两大主要理论

隐喻研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要用隐喻”。亚里斯多德认为人们使用隐喻的动机是学习中的愉悦和展示自己博学的欲望，而马库斯·图留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的说法是因为隐喻是比较高雅的修辞手段，所以使用隐喻可以帮助人们发现自己的创新能力（Black 1954: 64）。也有人认为使用隐喻就是为了语言上的节约，因为“这个女人是朵花”比“这个女人象朵花一样美丽”短。亚里斯多德和西塞罗对隐喻的论述使隐喻成为欧洲两千年雄辩术（Rhetorik）和文体学（Stilistik）中研究历史最长的修辞格之一。正因为隐喻研究的历史很长，所以人们很容易认为隐喻是一个定义精确的概念。实际情况却恰好相反，即使在隐喻研究成为“显学”的今天，到底什么是“隐喻”，也还远远没有定论。

第一个给隐喻研究理论分类的是布莱克。他把隐喻研究理论分为比较理论（Vergleichstheorie）、替代理论（Substitutionstheorie）和互动理论（Interaktionstheorie）。布莱克不是第一个试图修正亚氏理论的人，但他是第一个成功的。他把亚氏的理论总结为比较理论，把马库斯·法比尤斯·昆提良（Marcus Fabius Quintilian）的理论总结为替代理论，而把他自己与理查兹的理论命名为互动理论（Black 1954: 66 ff. <sup>①</sup>），这一分类可用下图表示：



图 1.1-1 隐喻研究理论的分类

关于隐喻研究理论的分类请参见 Kurz (1988: 7 f. )。

以下谈谈布莱克对这些理论的划分。

### 1.1.1 比较理论与替代理论

布莱克对比较理论的定义是：

如果一个作者认为隐喻就是把一种业已存在的类似 (Analogie) 或相似性 (Ähnlichkeit) 呈现 (presentation) 出来, 他所持的这种看法我就称之为比较理论 (a comparison view of metaphor) .

(Black, 1954 : 66)

与比较理论不同的是, 替代理论的重点在于它除了“本体” A 和“喻体” B 之外还引入了一个明示的 (explicit) 或隐含的 (implizit) “自有词” (verbum proprium) C。布莱克对此的定义是：

任何一种定义, 如果其出发点为隐喻就是用 一个隐喻性的表达 (Metaphorischer Ausdruck) 替代一个与其对应的“本义表达” (äquivalenter wörtlicher Ausdruck), 我在以后都称之为隐喻的替代理论 (a substitution view of metaphor).

(Black, 1954: 61)

15 年后, 布莱克决定准确地界定比较理论与替代理论的区别<sup>①</sup>。关于这两个理论的区别, 还有许多其它研究者作了很多探

在他后来的文章“再论隐喻”中布莱克写道：“简言之, 替代理论把隐喻所在 (locus) 的整个句子看成一系列句子的本义 (wörtliche Bedeutungen) 的替代, 而比较理论则把这种猜测中的本义句 (unterstellte wörtliche Paraphrase) 看成具备某些相似性 (Ähnlichkeit) 或类似性 (Analogie) 的陈述, 并由此在每个隐喻中得出一个压缩了的或者省略了的明喻。” (Black 1977: 391)

讨。不过，总的说起来，所谓比较理论就是认为隐喻可以看成缩短了明喻（“A 像 B”一样）而替代理论则认为在隐喻中一个另外的、陌生的词（Fremdes Wort）替代了那个“自有”（Eigentliches Wort）的词（“A 是 B”替代了“A 像 B 一样”）。在这里我想举一个经典的例子来说明：

(1) 阿喀琉斯（Herkules）是一头狮子。

比较理论与替代理论都认为这个表述中存在语义失常，因为阿喀琉斯不是狮子，而是人，所以按照真值条件来讲这个表述为假，如果“阿喀琉斯”不是一头狮子的名字。而根据赫伯特·保罗·格瑞斯（Herbert Paul Grice）的“会话准则”（Conversational Maxim）（何自然 1988：77 ff.），接受者必须认为这是一个理智的表述，而非说话者的梦呓。所以，如果想听懂这句话，他就一定要为自己解释（Interpretieren）这句话，例如他可以把这句话解释为一个省略句，并将它还原为明喻“阿喀琉斯像一头狮子一样勇敢”。接受者这样解释这句话时（绝大多数时候他这样解释是不自觉的，这一点在后面还会有详细讨论），他就把该隐喻看成了一个缩短的明喻，也就是说，他不自觉地运用了比较理论。

比较理论的始作俑者是古典雄辩术理论家昆提良，以下引文是他对隐喻的定义：

总的说来，隐喻是一个较短的明喻，它与明喻的区别在于，明喻提供的比较包含了我们想要展现的事物，而隐喻则是用自己替换了事物本身。如果我说某人“像狮子一样”做了某事，这就是明喻，而如果我说“他是一头狮子”那就是隐喻了。

（Quintilian, 1982：79）

关于隐喻是否是一个缩短的明喻，有很多争论，在此我只讨

论比较理论与替代理论的区别。替代理论认为隐喻不是缩短的明喻，而是一个非自有的词的一个特性替代了一个“自有的词义”。就例(1)而言，赞成替代理论的研究者在这个表述中找到了一个替代，即“狮子”这个词的一个特性(Eigenschaft)——也就是“勇敢”，在这里它即是那个“自有词”——被“狮子”这个词所替代。因此，“狮子”就是那个非自有的词，因为它本来不属于这个句子<sup>①</sup>。说话者本来要说的是“阿喀琉斯很勇敢”，但“勇敢”这个词太陈旧，说话者采用“狮子”就显得很新颖。更重要的是，“狮子”与“勇敢”并非同义词，否则，就没有隐喻而只有同义词研究了<sup>②</sup>。非常有意思的是，我们可以证明“勇敢”是“狮子”的一个特性。像“狮子”这样的词包含着一系列的义素(Merkmale 或者 seme)，可用下表列示：

表 1.1-1 单词“狮子”的义素

狮子
[+生物]
[+动物]
[+男性]
[+群居]
[+勇敢]
[+强壮]
[+敏捷]

<sup>①</sup> “狮子”这个词又称为“陌生的词”(fremdes Wort)(参见 Rüdiger Zymner 1993: 12)。

但是，可以想像一些(甚至很多)同义词都是通过隐喻产生的，当然这个想像还必须经过研究论证。

<sup>②</sup> 这些语义标记(semantischen Merkmale)也可以看成蕴涵。到第三章还会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

续表 1.1-1

狮子
[+ 食肉]
[+ 凶狠]
[+ 发臭]
[+ 懒惰]
等等

接受者听到“阿喀琉斯是一头狮子”这样的表述之后，他马上在自己的大脑中过滤这个表格，一直到找到义素“勇敢”。这个义素本来不属于“阿喀琉斯”这个词，但在这个表述中却正是说话者想要粘贴到这个词上去的。因此“自有的”那个表述应该是“阿喀琉斯很勇敢”，但是说话者想要躲开这个“自有的”表述。所以他选用了“狮子”这个词，因为“勇敢”是“狮子”这个词公认的义素，并用“狮子”这个“非自有的词”替代了“勇敢”这个“自有的词”。

替代理论的创立者是亚里斯多德。亚氏对隐喻的定义是替代理论的基石：

隐喻是一个陌生的名词性词<sup>②</sup>的转移（Übertragung），不是从“种”（Gattung）转移到“类”（Art）就是从“类”转移到“种”，或者从一个“类”转移到另一个“类”，或者依照“类似”（Analogie）完成转移。从“种”转移到“类”的例子如：“我觉得这艘船停步未动”。在这里船的停泊被称作“停”的一类。

这是一个认知过程。“心智”（Mental）和“认知”（kognitiv）这两个概念将在第三章中详细介绍。

<sup>②</sup> 亚里斯多德这里所说的“名词性词”包括名词、代词和形容词。

从“类”转移到“种”的例子如：“俄底修斯完成了一万件高尚的业绩”，在这里“一万件”意为“很多”并且占据了“很多”的位置。从一个“类”转移到另一个“类”的例子如：“用青铜摄取灵魂”和“用坚硬的青铜切取”；在这里，“摄取”的意思是“切取”，而“切取”的意思是“摄取”。两者都是“获取”（wegnehmen）的一种。

（亚里斯多德，1982：77）

我想用下图总结以上两个理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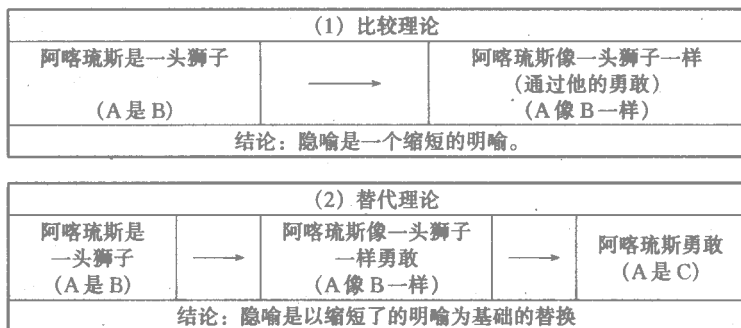


图 1.1-2 比较理论与替代理论

从这个图也可以看出，比较理论与替代理论有着共同的基础，即隐喻是明喻的变种。准确地说，比较理论是替代理论的一个“特殊情况”，对此，布莱克曾经写道：

值得注意的是，“比较理论”是“替代理论”的一种特殊情况，因为它主张隐喻的陈述（*metaphorical statement*）可以由一个与其对应的本义明喻（*durch einen äquivalenten wörtlichen Vergleich*）替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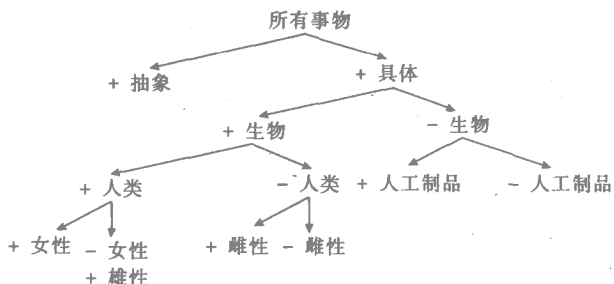
(Black, 1954: 66)

正因为如此，有很多研究者把这两种理论统一称为替代理论。这种看法得到了普遍的支持。本书亦从此说。

在这里还想借这个机会介绍一下术语“语义失常”(semantische Anomalie)<sup>①</sup>。亚里斯多德认为词语转义(Tropus)都是语义上的偏离，也就是对语言系统规则的破坏。隐喻当然也不例外<sup>②</sup>。对于亚氏来说，隐喻对语言系统的破坏就体现在语义失常中。要说明语义失常，先要说明义素(Sememe)。义素也称作“语义成分”(sense component)、“语义标记”(semantic Marker)、“语义特征”(semantic Features)，在生成语义学中还称为“高层谓语”(Higher Predicate)(武谦光, 1994: 98f.)，以下我用施瓦兹与舒尔(Schwarz/Chur)《语义学》中的一个图示来说明亚里斯多德对世界的划分：

“语义失常”还有很多其它的叫法，比如“语义不一致”(Semantische Unverträglichkeit, Uwe Kjär: 195)和“语义不兼容”(semantische Inkompatibilität, Zymner, 1993: 20 f.)等等。

② 格哈德·库尔兹(Gerhard Kurz)反对亚里斯多德的意见。他认为隐喻不是对一般语言运用规则的破坏，因为，隐喻不是对一般语言运用的偏离，它就是一般语言运用。准确地说，它是在一般语言运用中对一般语言运用的偏离(Sie ist eine Abweichung vom normalen Sprachgebrauch im normalen Sprachgebrauch)。它是在句子中、在特定的语境中、在特定的条件下对一个词的超乎常规的使用。我们不能像在一个语言群体中认识一个词的使用规则那样来认识一个隐喻。我们只能理解一个隐喻。隐喻没有规则(usuell)，它是随机的(okkasionell)。为了解一个表述的隐喻意义，我们必须始终明了整个语言行为(Sprechakt)。使用隐喻是违反了一个词的使用规则，但是这个规则仍然没有改变。隐喻只违反了常规的某些点(Die Metapher bricht punktuell eine Konvention)。隐喻是一种偏离——但它并非偏离了前面提到的那种本义的使用规则(wörtlicher Gebrauch)，而是偏离了一个词占统治地位的、标准的使用规则，即它的标准意义(Standardbedeutung)。(Kurz, 1988: 16 f.)



(Schwarz/Chur 1996:38)

图 1.1-3 义素分析举例

图中的每个义位都是一个语义成分。所以，每个单词都是义素的集合。照此道理，“阿喀琉斯”这个词由以下义素构成<sup>①</sup>：

表 1.1-2 单词“阿喀琉斯”的义素分析

+ 具体
+ 生物
+ 生命
+ 人·类
+ 雄·性
+ 勇·敢
等等

为了说明语义失常，我以“阿喀琉斯是一头狮子”为例，分析“狮子”的义素如下：

<sup>①</sup> 所以语义标记就是那些“构成这个词的语义价值（den semantischen Wert dieses Wortes bilden）的意义成分（Bedeutungskomponente）。”（Grewendorf/Hamm/Sternefeld, 1991: 305）。John Lyons 把这些意义成分称为“语义成分”（semantische Komponente, Lyons, 1995: 171）。

表 1.1-3 单词“狮子”的义素分析

+ 具体
+ 生物
+ 生命
- 人类
+ 动物
+ 雄性
+ 勇敢
等等

而在“阿喀琉斯是一头狮子”这句话中，“阿喀琉斯”的义素发生了变化：

表 1.1-4 “阿喀琉斯是一头狮子”中“阿喀琉斯”的义素分析

+ 具体
+ 生物
+ 生命
→ + 人类
→ - 人类
+ 动物
+ 雄性
+ 勇敢
等等

按照这个分析，阿喀琉斯就得同时既是人类又不是人类，而众所周知，一个生物或是人类或不是人类。上表中用箭头标出的义素矛盾就是“语义失常”(Funk-Kolleg 1977: 77 f.)。在 20 世纪，生成语义学又尝试使用预设 (Präsupposition) 来解释它 (同上: 98)。因为例 (1) 中存在语义失常，所以它一向被看作对语言系统规则的破坏。昆提良甚至认为所有的修辞格都是对语言系

统的偏离 Ueding/Steinbrink 1994: 299)。比较理论和替代理论的共同点就是认为隐喻是对语言系统的破坏，包含着语义失常。而比较理论解决语义失常的办法就是把隐喻解释为一个缩短了了的明喻。因为“阿喀琉斯是一头狮子”被解释为“阿喀琉斯像狮子一样勇敢”，阿喀琉斯就只是“像”狮子，而不再“是”狮子。既然他不“是”狮子，语义失常也就不存在了。

替代理论采用的是另一个办法。它认为“阿喀琉斯是一头狮子”这个表述是“非自有的”，在它的背后还有一个“自有”的表述，即“阿喀琉斯勇敢”。在这个表述中，“自有”的词是“勇敢”，而它被“非自有”的词“狮子”代替了。因为“自有”的词是“勇敢”，而说一个人“勇敢”并不存在“语义失常”，所以也就不存在语义失常了。除了其它问题之外，替代理论在这里还有一个小问题，即按照这个理论，在任何表述的每个位置都有一个“自有”的词，反过来说，每个词都有一个“自有”的意义。从情境交际学说来看，这个说法是大有问题的，因为我们知道，每个词的具体意义都是在交际情境（*Kommunikative Situation*）确定的。我们可以说，每次交际中使用的词，其意义在这个交际中都是“自有的”。反过来说，在交际情境没有确定的情况下，没有哪个意义是“自有”的。库尔兹对此有以下说法：

语言的形式是一个交际情境的部分和功能。不存在什么语言自身的本义（*Es gibt keine sprachliche Bedeutung an sich*），而只有在特定情境中间、针对特定说话者和听话者及特定意图的意义。我们想明白一个词的意义，就必须明白它的运用。所以，隐喻的意义就不一定是句法—语义单位“句子”的特性，也可以是一个“表述”（*Ausserung*）的特性。有了表述才有了交际情境，而只有交际情境才能决定一个表达（*Ausdruck*）是否是

隐喻性的。

(Kurz, 1988 : 13)

像“阿喀琉斯是一头狮子”这个表述只有在阿喀琉斯是一个人、一个战士的交际情境中才能是一个隐喻。如果阿喀琉斯本身就是一头狮子的名字，那就谈不上隐喻了，它只不过是一个真实的陈述而已。

比较理论和替代理论都认为隐喻是对语言形式的一种修饰、一种雕琢，是依附于语言形式的，其代表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昆提良、笛卡尔、康德、洛克、德曼<sup>①</sup>、魏恩里希 (Weinrich) 等等。他们的观点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差异，但主旨却都与替代理论相去不远。替代理论新近的代表有雅克·拉康、雅克·苏瓦叶。其中拉康认为隐喻可以看作意识向潜意识的转移 (Lacan 1975: 208)。虽然在我们的世界中隐喻无处不在 (例如布莱克就认为成语、讽喻 (Allegorie) 和谜语都是隐喻 (Black 1954: 57))，但是也不能把一切语言现象都看成隐喻，因为都是隐喻就等于都不是隐喻。

### 1.1.2 互动理论

布莱克对隐喻研究所作出的最大贡献，是他在理查兹学说基础上提出的互动理论。对于理查兹来说，隐喻的“替代”根本不体现在词甚或语言本身的层次上，所以他不认为隐喻是修辞格。对此他曾写道：“一个词通常不是一个单独存在 (Isoliert) 的表达之替代物，而是普遍观点的组合 (Kombination)。” (Richards

在“隐喻认识论”一文中他写道：“隐喻和转义词语，包括所有的形象语言 (figürliche Sprache) 都是挥之不去的问题。现在公认它们不仅导致哲学讨论 (philosophischer Diskurs) 的混乱，而且导致语言使用的混乱——包括历史描写和文学分析中语言的使用。” (De Man 1978: 414)

1936: 34) 在此基础上，布莱克更进了一步：

正是在科学陈述的精确性不成问题的场合我们才需要使用隐喻。隐喻性陈述并不是对形式上的明喻或其它本义陈述的替代，它有着自己独特的作用和成果。

(Black, 1954: 68)

对于几千年不变的隐喻研究来说，这段话堪称石破天惊，而且得到了 20 世纪诸多著名语言学家的支持，如哈拉德·怀特 (Harald Weydt)。怀特把历史上名家研究隐喻的意见总结为四个观点，并认为现代隐喻研究必须与之划清界限。关于这四个观点，怀特在其文章“知识一言说一隐喻”中作了如下介绍：

我们应当与四个流行的关于隐喻的观点分道扬镳，它们是：

- 1) 隐喻应该理解为对正常语言的偏离，
- 2) 因为偏离，所以它们不是本源的 ( nicht ursprünglich) .
- 3) 隐喻的产生是因为要避免一个“自有的词”，
- 4) 隐喻妨碍理性认识 ( rationale Erkenntnis)。

(Weydt, 1986: 89)

互动理论从根本上撼动了几千年高山仰止的亚里斯多德理论。如果我们认为隐喻只是一个修辞格，那么隐喻就永远只能是一种对语言形式的雕饰，隐喻就会被排除在对事物本源的探索之外，因为语言上的雕饰虽然很美，但它会使我们对事物本源的探讨更加复杂并影响到理性的认识。

理查兹自己对互动理论的定义如下：

简言之，我们在使用隐喻时将两个不同的“表象”（Vorstellung）带入一个互动的关联（gegenseitigen aktiven Zusammenhang）之中，这种关联由一个词或一个短语体现，其意义则是两个表象互动的结果。

（Richards, 1936: 34）

在他的名文“再论隐喻”（Mehr Über die Metapher: 1977）中，布莱克详细说明了“互动”的实现：

在一个特定的隐喻陈述的上下文中，两个事物（Gegenstand）以下列方式完成“互动”：（I）主事物（Primärgegenstand）的存在刺激了听者，迫使他挑选出次事物的一些特性（einige der Eigenschaften des Sekundärgegenstandes）；（II）并且要求听者构建（konstruieren）出一个平行的“蕴涵关联”（Implikationszusammenhang），该蕴涵关联不仅要与主事物相符合，而且（III）还要在次事物中引起相应的变化（parallele Veränderungen im Sekundärgegenstand）。

（Black, 1977: 393）

定义读起来莫测高深，举个例子很容易理解。布莱克在这篇文章中所举的例子就很好，这个例子是“穷人是欧洲的黑人”（Die Armen sind die Neger Europas）。替代理论的妙方是把这句话“还原”为“穷人好像欧洲的黑人一样”（Black 1954: 69），而互动理论则将这个表述中的两个表象“欧洲的穷人”和“黑人”引入一个相互作用的关联之中，“欧洲的穷人”于是就具有了“黑人”某些特性。这里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所谓“互动”就是两个“表象”的融汇，隐喻是这个融汇的结果。

在互动理论出现之后，从语言形式上看，所有的隐喻表述中

依然存在着“语义失常”，但互动理论并不讨论这个经典问题，因为它根本就不是从语言形式上，而是从“表象”的层次上来研究隐喻的。它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出发点，即两个“表象”是怎样融汇在第三个表象中的。进入 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互动理论的研究中出现了两个重量级学者，他们就是生成语义学的扛鼎人物乔治·莱柯夫( George Lakoff )和哲学家马克·约翰逊。本书稍后会重点介绍他们的理论。

## .2 隐喻研究几个核心概念的讨论

### 1.2.1 词语转义 ( Tropus )—隐喻 ( Metapher )—转移 ( Übertragung )

在本节中我想专门讨论一下“隐喻”这个术语。在探讨“隐喻”之前，首先要讲一下“词语转义”(Tropus)。“词语转义”来自希腊文中的 tropos，有“转换方向、旋转、变化、短语、措辞、说法”等意思。在古典雄辩术中，基于纵线关系( Paradigma )的词语转义现象包括换称( Antonomasie )、着重( Empase )、讽刺( Ironie )、间接肯定( Litotes )、隐喻( Metapher )、转喻( Metonymie )和借代( Synekdoche )等。基于横线关系( Syntagma )的词语转义现象则是修辞格( Bußmann 1990: 809)。对此，约瑟夫·柯佩施密特( Josef Kopperschmidt )有以下说明：

所谓词语转义指的是一个词从它的本义 (eigentliche Bedeutung) 转换到一个非本义的 (Uneigentlich)、形象的 (bildlich) 意义上去，其目的是让一个概念无意义的名称变得生动易懂。

(Kopperschmidt, 1990a: 120)

如果把这个定义与 1.1.1 中亚里斯多德的定义相比较，我们会发现它们非常相像。事实上，亚氏在“词语转义”和“隐喻”这两个概念的区分上确实有点小问题。因为他在《诗学》中以非常容易混淆的方式使用过这两个概念。首先，他把所有的“词语转义”统称为“*metaphora*”（Ueding/Steinbrink 1994: 287）。按照亚氏的意思，在这个“*metaphora*”下面有四类“转移”，即（1）从“种”到“类”的转移；（2）从“类”到“种”的转移；（3）从一个“类”到另一个“类”的转移；或者（4）依照“类似”的转移。于丁（Ueding）和斯泰因布林克（Steinbrink）认为（1）和（2）属于借代（在后面我将具体讨论这两个概念）。（4）谈论的是基于“类似”的隐喻。亚里斯多德这里说到的“类似”（*Analogie*）并非后世大部分研究者谈论的“相似性”（*Ahnlichkeit*）。我觉得后世有关隐喻的争论，有相当部分是来自对这两个概念的混淆。

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于丁和斯泰因布林克认为（3），也就是从一个类向另一个类的转移，才是修辞格“隐喻”（Ueding/Steinbrink 1994: 288）。所以在亚里斯多德的《诗学》和《修辞学》中，实际上有两个 *metaphora*。一个是作为修辞格的 *metaphora*，另一个是作为“词语转义”总称的 *metaphora*。亚氏本人当然非常清楚他说到的是哪一个 *metaphora*，问题是有很多后来者并不知道，或者他们虽然知道，但并没有随时注意厘清，其结果是现在大家一见到 *metaphora* 就理直气壮地译成“隐喻”，殊不知它在亚氏著作的很多地方是要解为涵盖范围大得多的“词语转义”<sup>①</sup>的，简明起见，这个问题可用下图表示：

<sup>①</sup> 亚里斯多德经常说到隐喻时实际指的是“词语转义”，参见 Aristoteles (1980: 176 f. 和 197 f.)

